



老 | 清 | 華 | 講 | 義

LAO QING HUA JIANG YI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老 | 清 | 華 | 講 | 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438 - 6125 - 1

I. 中… II. 梁… III. 学术思想 - 思想史 - 中国 - 清代
IV. B249.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183 号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策 划: 李声笑

出 版 统 筹: 莫金莲 廖 铁

责 任 编 辑: 李 茜

装 帧 设 计: 李 斌 黄 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公司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 / 16

印 张: 22. 5

字 数: 313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125 - 1

定 价: 36. 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梁启超与清华素有缘分。早在1914年冬，梁启超即因喜欢清华的幽静而暂居清华园工字厅西客厅，写成《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他与清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觉无限愉快”。书成后赋诗一首，赠清华师生。此后梁启超不时来校讲学。从1923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开设“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每个星期，他在清华四天阅读、讲课或辅导学生，在城内三天，处理其他事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1923年至1925年春，原是他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学术而编写的讲义。根据作者的说法，本书“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他将清代学术置于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发展中，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将其启蒙、发展与流变展示在我们面前，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个大问题。

“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这种“笔端常带感情”的使命感贯穿于全书。作者借用西方新方法梳理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清学乃“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是“以复古为解放”，其所开辟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具有启蒙意义，“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让我们看到了作为学者的梁启超依旧没有忘怀他作为启蒙思想家的责任。正因为这样，钱穆对梁启超的观点并不赞同，写作了一本同名

著作予以“修正”。

但梁启超的启蒙情怀无损本书在学术史研究上的开拓性地位，学术界认为，这是一本开创性的百科全书似的清代学术史，突破了学案体的学术史写作，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史范式，是一本今日研究清代学术和思想文化无法绕过的经典名著。

本书先后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单行本。1932年被收入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之“专集”中。



梁著六种重版序

梁任公先生之学问文章，宜久为世人所共谂；况最近国民政府由领导抗战伟大领袖蒋先生之提议，且尝明令褒扬，当无待余之辞费。而先生一生之著作，亦已尽收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版之《饮冰室合集》中，尤无待余之表章。兹姑就此次选取数种付诸重镌之因由一述之。

数月前余偶遇旧友之供职侍从室者，述及蒋先生极赏任公先生遗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以为大足药国人不悦学之病。友固知余主持中华书局编务者，因怂急重版。夫近三百年来之学者诚已本科学方法将我国数千年来之文化遗产为彻底之整理矣。国人不欲享受此无尽藏之遗产则已，苟欲之则任公先生是书实其唯一之褒论；即任公先生本人固亦此期中从事此项整理功夫之后劲，出其蕴，自能道人之所不能道。虽微吾友言，固犹当重校以问世。

任公先生固持经今文家言者。经今文家之所长，在能辨别古籍之真伪；而辨别古籍之真伪则固治史者所必不可少之功夫。故先生之学以史学为独精，真能推倒一时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而导夫今世治史者之前路者也。因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外，益选取其有关史学之《先秦政治思想史》及《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编，一并付重镌，而殿以旧作传记三种。

我国学术本渊源于先秦，任公先生之《先秦政治思想史》虽曰偏于政治，然我国学术思想原以政治伦理为中心，而政治伦理且往

往不分，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故偏也而不失为全。先秦思想既道吾国学术思想之源，近三百年之学术思想则固已竟其委。余故以是二者为姊妹篇，庶几金声而玉振之矣。

《中国历史研究法》正补两编，则任公先生晚年杰作，是出其一生治史之心得，以惠后学者也，慨然竟以金针度人，如之何可弗广其流传，今之言历史研究法者类出稗贩，惟此两编为作者自抒心得之作，世有欲治国史者，此其南鍼矣。

至于所选之传记三种——管子传，王荆公中国伟人传五种——其所描写之人物，夷吾器小，主父用夷，安石奸邪，三保奄竖，即博望亦且以凿空见病，班定远而外，类皆旧日治史者所不屑道。盖国人习性，好静不好动，主退不主进，之数人者皆动而进者也。自先生登高一呼，举世翕从，至今莫能议，于是国人始悟变法非奸，开边无罪，是所谓廉顽而立懦矣。然而今之世固犹有主退让屈服以求和平者，斯非先生之罪人欤，余故特为表而出之。况传记一体，虽向为吾国古文家所重视，顾类皆直叙个人行谊，但足知人，不足论世，转令今人兴吾国无传记之叹。先生之作，以文体论，在吾国亦为创体，然四十年来继起者殊寥寥，余诚惧其体之遂湮灭也，亦欲复张之。

今日者借史学，振民气，已定为国是，余之此举，其或亦不无涓埃之效乎！愿毋以“瓿簋满篝汗邪满车”见讥，斯幸矣。

抗战第七年首金兆梓叙于东川北泉之听松涛馆



目 录

梁著六种重版序	(001)
一 反动与先驱	(001)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011)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018)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025)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031)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	
附: 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 王学家 李穆堂	(036)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顾亭林 阎百诗	
附: 胡朏明 万充宗	(049)
七 两畸儒——王船山 朱舜水	(071)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万季野 全谢山	
附: 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082)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 其他	(094)
十 实践实用主义——颜习斋 李恕谷	
附: 王昆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	(103)

十一	科学之曙光——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137)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147)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经学、小学及音韵学	(175)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220)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	(264)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乐曲学	(323)



一 反动与先驱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 1923 年。上溯三百年前之 1623 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 1000 至 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素朴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分，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①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

^① 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的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



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来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2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弇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惟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讎。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梃击”、“移宫”诸大案，^①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得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

① 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窗户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赞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个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帐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



又说：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

朱舜水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顾亭林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
《日知录》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

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
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存。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



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

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禎十七年（1644年）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分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五年（1587年），卒崇禎十五年（1642年），年五十六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贵、蜀、桂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①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

^① 潘稼堂（末）《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

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①。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德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年（1633）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论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庸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

^① 《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鬲之范鲜经，而侈谈吕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伦比。”